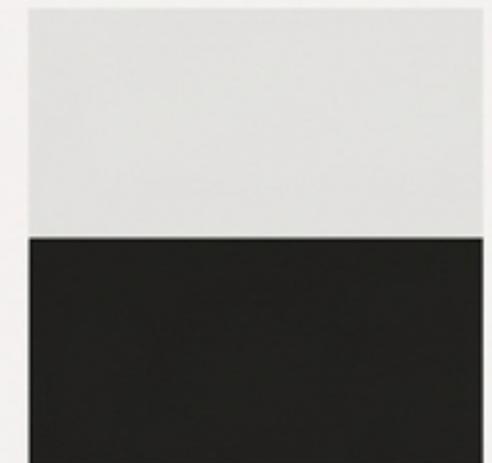


中产阶级与民主：一个危险的迷思

揭开“中产阶级=民主”背后的复杂真相



一个经典的承诺：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引擎



经济发展

中产阶级壮大

民主化

社会稳定器 (Social Stabilizer) :
有产者倾向于温和改良，反对暴力革命与寡头垄断。

认知动员 (Cognitive Mobilization) :
受教育程度高，更容易认同法治、宽容、公民自由等价值观。

“没有资产阶级，就没有民主。”
——巴林顿·摩尔 (Barrington Moore)

理论的裂痕：历史的意外

然而...当这个理论遭遇现实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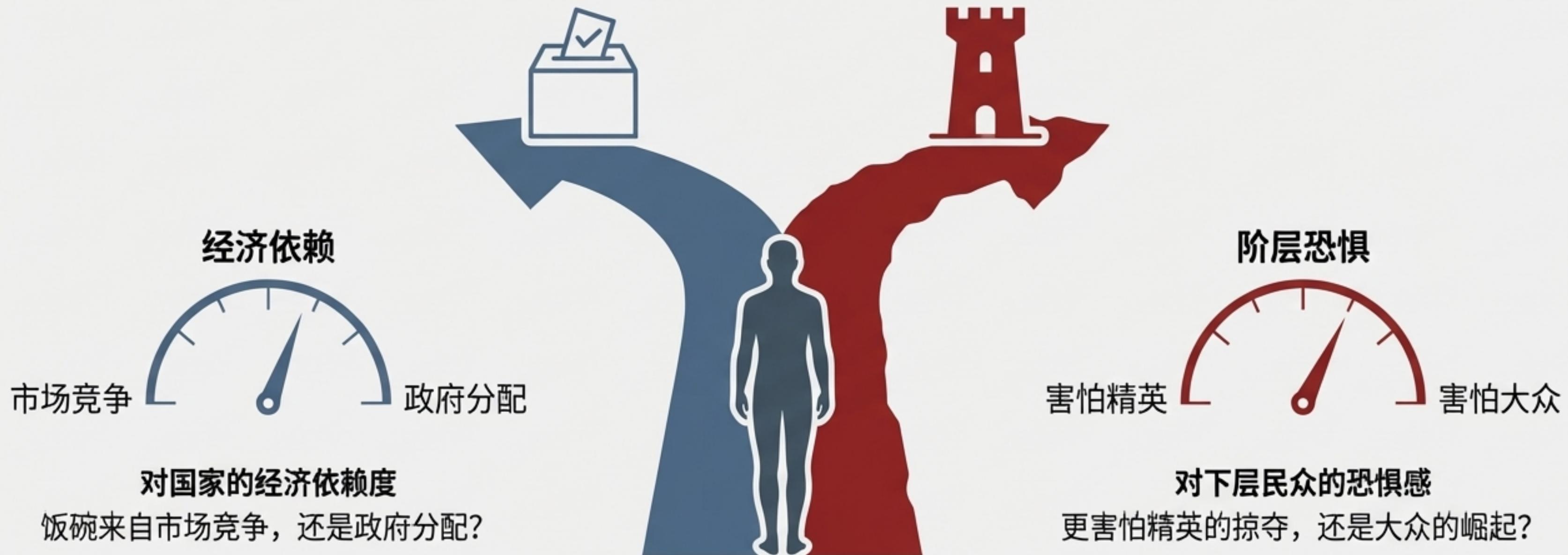
1930年代 魏玛德国：庞大的中产阶级选择了纳粹主义。

1960-70年代 拉丁美洲：经济发展后迎来的不是民主，而是残酷的军事独裁（阿根廷、巴西、智利）。



全新视角：依附性民主派 (The Contingent Democrat)

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，不是忠贞不渝的信仰，而是一场精于计算的交易。



理性的背叛：魏玛德国与“地位恐慌”

“他们最害怕的不是饿肚子，
而是无产阶级化。”

双重打击：恶性通胀（1923）+
全球大萧条（1929）。

核心动机：对失去体面、尊严和社
会地位的恐惧。

抛弃混乱的民主，拥抱承诺秩序的
强人。





“中产阶级的政变”： 1973年的智利

中产阶级成为推翻民选政府的
急先锋。

Context:

- 威胁：阿连德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触动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身份。
- 行动：主动制造危机，为军事政变铺路。
 - “敲锅游行”（March of the Empty Pots）
 - 卡车司机、医生等行业协会（Gremio）组织全国性大罢工。

Justification:

暴力和镇压是“恢复社会应有等级”所必须付出的“可以接受的代价”。

希望的另一面：中产阶级成为民主英雄的时刻

在特定条件下，中产阶级确实能扮演我们最初想象的那个角色。



韩国 (South Korea)



台湾 (Taiwan)

韩国的答案： 一个相对**平等**的社会

“有增长的**公平**”
(Equity with Growth)

经济增长成果被广泛分享，社会贫富差距不大。
中产阶级地位焦虑感不强，不视底层劳工为威胁。
结果：形成了反抗独裁的**跨阶级联盟**。

“领带部队” (The Tie Brigade) —
写字楼里的白领与学生、工会站在一起。



台湾的路径：经济 独立与公民社会

经济独立转化为政治自信。

经济基础：建立在千千万万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之上，而非依赖党国的大财阀。

结果：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更独立，更有底气争取政治权利。

公民社会：专业人士组织的非政治性团体（如环保、消费者权益）成为“民主参与的训练场”。



当代的困境（一）： 被国家“驯服”的中产

核心理念：

一种用政治自由交换稳定与增长的**心照不宣的契约**。

案例：

海湾国家（Gulf States）：“食利国家”模式 –
无代表权，但也不用纳税+高福利。

俄罗斯（Russia）：用自由交换普京承诺的稳定、
秩序和养老金。

中国（China）：“绩效合法性”契约 – 党负责增长
与稳定，中产默认其执政地位。





当代的困境（二）： 民主的“纠正者”

核心理念：在已有的民主国家，中产阶级因地位焦虑而拥抱威权，推动民主倒退。

案例：

泰国（Thailand）：“**黄衫军**”支持军方政变，纠正“多数人的暴政”。

巴西（Brazil）：因治安恶化和地位焦虑，成为右翼强人博索纳罗的票仓。

印度 & 东欧（India & Eastern Europe）：支持民族主义强人，换取经济发展和“**福利沙文主义**”。

结论：中产阶级的双重面孔

民主盟友
(Democratic Ally)

条件：经济独立 + 社会平等

案例：韩国，台湾

威权盟友
(Authoritarian Ally)

条件：依附国家 + 恐惧底层

案例：魏玛德国，智利，当代民粹

真正重要的，不是中产的规模，而是他们的**安全感**

一个国家民主的韧性，取决于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安全感。

一个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，才是决定中产阶级政治选择的**关键**。



一个留给你的问题

在你所处的社会中，
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的关系，
是正在走向相互恐惧和对立，
还是在构建一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？
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或许正预示着未来的方向。